

瞿秋白与国学

□梁化奎



瞿秋白国学修养根基深厚。他多番有意志向国学，提出重兴中国古文化要有世界的眼光。他以政治诉求为首位的文化观一度曾经影响到他对国学的看法，但随着其思想感情向着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和皈依，他也逐渐能够较辩证地看待国学。

什么是国学，迄今这个概念还在被学界不断界定之中。然而就其内涵来讲，以儒释道为精魂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则是构成国学的主干并使之得以彰显。讲到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与国学的关系，在时下热衷于炫述国学者法眼里，常认为他对于中国古文化批评得过猛，否定得太多。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瞿秋白对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力倡国学的“东方文化派”的确一度曾经采取了极激的批判态度，然而，这是否就能够代表他之对于国学的全部态度、观念和情感呢？这个问题很是值得

研究。

一、多番有意志向国学

瞿秋白出身于祖上曾是世代簪缨的士的家族。晚清之际伴随着封建旧制度的逐渐沦丧，瞿氏家族也逐渐衰败。至民国初年，瞿秋白一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穷困，乃至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典当度日的生活。家境虽是如此，然其士的家风遗教犹存。瞿秋白曾说：“我的家庭，就是士的阶级。”在今日常州瞿秋白故居，仍可以看到在其进堂的后墙上留有“世食旧德”的家训旧刻。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彬，好黄老之学，工于传统山水画，并颇得时人好评。母亲金衡玉，文史诗赋皆有修养，亦是官宦家族出身。瞿秋白自幼除了跟随双亲习学诗书礼文、画山水画之外，还跟六伯父瞿世理学过金石篆刻。1917年秋瞿秋白进入京城读书。耳闻目睹这里新旧官僚腐败的生活，痛苦刺激之下，他曾考虑“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瞿秋白在新俄考察时曾表示：为了“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自己甘愿做一个始终是积极奋斗者的“小卒”。另据羊牧之回忆说，1926年夏的一天，瞿秋白曾经对他讲：“我这个人始终摆脱不了文人习气。今后革命成功了，年纪大了，我一定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到那时你也来帮同搞吧！”

瞿秋白国学修养根基深厚，这固然与其家学环境有关，但主要还是自身不辍习悟的结果。他在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来就看。”又

言，“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瞿秋白的国学修养还得益于他对多种文化资源的兼容并蓄。他自言：“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已经不能确切的证明自己纯粹的‘中国’性”，“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虽说如此，但从瞿秋白的一生看，与其情感结构、思维方式、深层人格建构及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以深刻影响的，无疑还是以儒释道为精魂的国学。

二、以世界的眼光关照国学

上个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现实处境，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其时国学面临的现实处境。由此出发瞿秋白进一步关照到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的文章中就提出：“要有世界的眼光”，“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显示出一种在世界维度下的文化自觉忧患意识。

在对中国文化现实出路的关注中，瞿秋白在俄考察时提出：“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在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进程中，“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或“泯没民族的个性”，去附庸所谓“新派”，这些做法都是不足为取的。“无民族性”，“无动的民族性”，也就“无所谓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的发展问题，1923年初回国后的瞿秋白深入拓展了他此前提出的“要有世界的眼光”的看法。他说：“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他在为当时上海大学的开办而拟定的教学方案中说：“远东四五千年的

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这并不是什么‘国粹’问题——而是因为中国旧式的宗法社会经济遇着欧美帝国主义,所不得不发生的适应作用。”一如现时“中国文艺之中‘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端倪”。应该说这样一种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维度,即便在今天也还是十分需要的。

三、渐及辩证地看待国学

对于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力倡国学的“东方文化派”,瞿秋白一度曾经采取了极激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宗法社会的文化”;它承载着“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东方文化派”却要竭力维护这种文化,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从这些认知和表述看,瞿秋白以政治诉求为首位的文化观显然影响了他的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全面认识。由于没有对中国古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作区别对待,因而这种批判就显得过于简单和笼统,缺乏辩证地分析和思考。然而,以此便判定瞿秋白是否否定国学的,同样不符合实际。应该说,他的这种批判并不能代表他之对于国学的全部态度、观念和情感。

进一步说来,瞿秋白对于国学的态度、观念和情感,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从他在生前最后五年间(1931年—1935年)的人生经历看,此间他不仅生活在国内血腥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而且还不得不承受着党内失范的政治斗争与其带来的巨大压力。那时,党内极左势力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路线让瞿秋白吃尽了苦头。他先在

1931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排挤出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后又因在党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的一组短评文章,被党内极左势力诬陷为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此情形之下,瞿秋白在思想和感情上渐渐显露出向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他在狱中撰写的《多余的话》及多首诗作,字里行间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其思想和感情向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皈依。

在上述嬗变过程中,尽管他仍未放弃对一些主张恢复“固有文化”的文人、学者的批判,但也显示出他这时已经能够渐及较客观、辩证地看待国学了。瞿秋白在1932年7月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还深刻指出:在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对于一切统治阶级的文艺,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他们都要批判,都要分析。这些文艺的内容,往往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会是简单的‘好得利害’,或者‘坏的利害’;也不会是‘革命时候没有用’,‘建设时期又有用’。”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的情形下,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应该说还是十分难得的。

四、不辍研究、传播国学

如前所述,瞿秋白早年受父亲的影响,较早即对释道二教“特殊有研究”。他曾说:“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据羊牧之回忆说,瞿秋白在中学读书时,枕边书桌上经常放置着旧小说、野史杂传、集释经注。一次秋白还曾对他讲:“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正是不辍的研究习悟,奠定了瞿秋白根基深厚的国学修养。

“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认为,“攻击旧道德并不是现在的急

务”,“只有攻击没有创造,就只能引起怀疑”,而且容易“发生误会”。他希望国内“多出几个纯粹的学者”。进而又强调指出:“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研究。”在他看来,中国古文化的重兴固然需要创造,但它却是重建本土性话语的创造。而为时人追慕的一些所谓“新”学,其实在中国就“用不着,也不能用”。这表明瞿秋白对待如何重兴中国古文化的问题还是十分审慎的。经过在新俄的考察研究之后,他认为,中国文化要想在历史进程中“增进人类的文化”,就必须敢于面对“困难环境而进取”,同时还要在这个进程能够“实现自我的个性”,“发展自我的个性”。

瞿秋白曾把研究、整理国故看作是一项重要工作,一项巨大的工程。1932年6月10日,他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的书,谢谢。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与瞿秋白不辍研究国学相伴而行的,是他对于国学的不懈传播。在俄国考察时,他曾向俄国人“解释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风俗,和对基督教的关系”;还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图书馆捐赠过经史子集、唐宋诗词等“一大堆中国线装古籍”,并且为在这里工作的一位讲师雕凿过一枚古朴风雅的狮纽石章。瞿秋白特别看重青年人对国学的研究学习。他在同青年人的促膝谈心中,不仅注重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力求运用其原理分析中国革命,还常常向他们介绍、讲解中国古典文学知识。陆立之回忆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秋白为我们讲解文学故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和某些名著,差不多我在阅读

之前就已从秋白那里先理解了。上海大学初建之时,瞿秋白亲自为一些学科、专业拟定了必修的和选修的课程,其中包括:文(群经诸子附)、诗词、戏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金石学及书画史、古籍校读法等。像前三门课程还是四年通修的必修课。他向社会学系的学生提出要求说:必要以一有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方能进行多方面之比较研究;“研究之最后期,并当以此社会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史料(所谓‘乙部’的国故——直至于志书等),以期切于实际”。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国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相当造诣、见地的,而其对于国学的传播也则是因时因事而不遗余力。

五、一生情系国学

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对于中国古文化的看法,尽管在认识上仍存在有不

够全面的问题,但随着其思想感渐渐向传统人文价值理念的游移和皈依,其观念中曾有的“精金”意识也在被再次唤醒而得到复归和强化。1932年6月20日,他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所谓古代汉文是包括《诗经》《书经》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而说的。”“将来的新中国里,将要设立科学院之下的古汉文系(和古代梵文,希腊文,拉丁文……等等同等看待)。”再就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看,无可讳言,他最后留给世人的无疑是一个病体羸弱而又忧心重重、有着悲剧式情怀的“文人”形象。文中他一咏三叹地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这就是说,瞿秋白在生命即将绝灭的前夜,他用以确认自我身份的,恰是时下人们

在认知和表述国学时最为常用到的一个关键词:“文人”。

总之纵观瞿秋白的一生,他所接受的家学教育,学识素养、惯性思维方式的养成,深层文化心理的构成,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割断了同国学的联系。一定意义上讲恰是因为他所积淀的国学修养,成就了他丰富而又厚重的一生。至于说他对主张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文人、学者曾经所作的批判,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批判除了有适应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之外,在当时也是为了整合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而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话语和纽带,以期有效表述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的自我整体形象。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上接第27页)影响“支部建在班上”后班级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支部建在班上”这一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学校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式的真正发挥效应。实行支委领导下的班长负责制,重点要处理好党支部和班委的关系。党支部是政治核心,实行监督保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支委(一般班长是支委或列席)讨论决定班级重大事件,诸如奖助学金评选、班级活动等。班长带领班委主持班级日常工作,两者职能要分开。党员可在班级中担任各种职务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党支部不可去包揽一切,到处去发号施令。班委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但要自觉接受党支部的指导。

2. 建立支部网络管理结构。注重班级支部的组织发展和学生党员帮扶工作,充分调动支部中每一个党员的积极性。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积极而稳妥地做好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严格把好入口

关,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在支委的领导下,建立班级支部网络管理结构,形成“1+1+1”的管理模式,一名党员培养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帮助一个思想后进或成绩不理想或生活困难同学。各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党员人数现已基本达到30%,形成“1+1+1”模式后,班级所有同学应都在这一管理结构中,每一个同学都在向心圆的点上,而这一圆的圆心就是班级支部。

3. 定期培训支委及完善考核制度。支部书记是支部的核心,其能力与素质决定支部工作的好坏。因此,学校分党委或总支应定期培训支部书记,辅导员应经常与支部书记工作交流,每学年或每学期对支委进行改选。学校要定期召开支部书记培训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学校党委的工作重点,经常邀请学校组织部门或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开办讲座。同时,学校应建立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听取支部工作汇报。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人,与学生关系紧密,应经常与支部书记交流工作,了解班级支部中

最新近况,在学校分管书记的指导下,帮助支部书记开展工作并适当参与,对各支部中出现的现象及时汇报,分析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负责对支部书记的考核并参与组织支部的改选。

4. 规范支部工作和健全规章制度。“支部建在班上”后,支部书记多有学生担任,由于支部书记来自班级,他们和普通同学朝夕相处,因而在工作中难免有顾虑,放不开手脚,不敢大胆管理,造成支部工作的不力,影响支部工作的发挥。党建规章制度,是支部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基础,健全规章制度能促进支部工作的规范。在坚持支部政治学习制度、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教育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制度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党建制度创新,如经常进行民意测评,佩戴党员标志,针对预备党员转正开展“我的预备期”述职,正式党员每学期书面汇报思想一次等。在支部与支部之间,可以经常召开示范支部大会,加强支部间的交流与学习。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